

瑞典多元文化政策初探

杨洪贵

内容提要:二战后,来源广泛的移民使瑞典由一个民族文化单一的国家转变为民族文化多元的国家。为此,1970年代瑞典政府开始实施多元文化政策,以应对外来移民问题,在文化保持、社会平等和政治参与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外来移民融入主流社会,构建社会和谐。面对1980年代以来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的不断波动所带来的严峻考验,瑞典坚持并发展了多元文化政策。

关键词:瑞典 移民 民族文化 多样性 多元文化政策

瑞典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并称为西方最早实施多元文化政策的三个国家。^①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作为移民国家,多元文化主义是在依靠移民来创建国家的传统政策——同化政策失败的情况下出现的。而瑞典作为北欧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国家,曾经是“一种语言、一个种族和一种宗教”的同质社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依然保持着民族单一和文化同质。为何瑞典能继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之后将多元文化主义宣布为国家政策呢?鉴于国内学术界对瑞典多元文化政策鲜有介绍,且今年是瑞典政府宣布的“多元文化年”,^②本文拟就瑞典多元文化政策的由来与发展进行探讨。

一 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形成

历史上,政治统一、宗教单一和教育制度的完善促进了瑞典民族文化同质的

^① Christine Inglis, *Multiculturalism: New Policy Responses to Diversity*, Paris : Unesco, 1996.

^② “2006 – The Year of Multiculture in Sweden”, http://www.swedenabroad.com/pages/news_46191.asp. 13/07/06.

形成。19 世纪,瑞典人口的文化和民族背景有着显著的同质性。直到 1930 年,瑞典的非瑞典血统人口也不足 1%。^① 生活在北部的拉普兰人和芬兰人是瑞典主要的两个少数民族,此外还有少量的犹太人。虽然 1930 年代进入瑞典的移民开始超过移出瑞典的人口,但新来者主要是从北美回流的瑞典人,民族文化构成并未受到冲击。因此,二战爆发前,瑞典是一个典型的单一民族文化国家,使用单一的语言,信奉同样的宗教,拥有共同的历史。^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瑞典民族文化从同质向多元转变的起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和对被纳粹占领地上的人民的同情,瑞典在战争中援救和接纳了大量战争难民,包括 3.5 万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4.5 万挪威人和丹麦人以及 9 万芬兰儿童。瑞典的外来居民从 1939 年的 2.4 万人增至 1944 年的 18.5 万人。^③ 1942 年瑞典秘密接收了来自挪威的犹太人。1943 年 11 月丹麦和瑞典联合营救了即将被关进纳粹集中营的 6 千名丹麦籍犹太人。^④ 战争结束后,从纳粹集中营解救出来的 3 万人也转移到了瑞典。有些难民在瑞典居住几年后转向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移民,但多数却永久地定居在瑞典。^⑤ 战争难民成为瑞典历史上第一批人数最多的外来移民,它使瑞典在语言和种族方面高度单一的状态开始发生改变。^⑥

战后瑞典经济快速增长。1946—1950 年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 4.5% 的速度增长;^⑦ 1950 年代增长率 3.5%;^⑧ 1960 年代前半期则不低于 5%。^⑨ 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劳动力短缺。为此,瑞典放松了对北欧国家移民的入境限制:1943 年废除了对来自丹麦、芬兰、爱尔兰和挪威的移民的工作许可要求;1945 年

① Harald Runblom, "Swedish Multiculturalism in a Comparative European Perspective", *Sociological Forum*, Vol. 9. No. 4, 1994, p. 628.

② Tomas Hammar, *European Immigration Policy: A Comparative Stud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2.

③ Eytan Meyer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Policy: A Compar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ud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5, p. 148.

④ Harald Runblom, op. cit., pp. 628—629.

⑤ Eytan Meyers, op. cit., p. 149.

⑥ [瑞典]斯·哈登纽斯:《二十世纪的瑞典政治》,戴汉笠、许力译,北京:求实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6—47 页。

⑦ 同上书,第 48 页。

⑧ 同上书,第 62 页。

取消对丹麦和挪威移民的签证要求;1949年取消对芬兰的移民签证要求;1946年瑞典和丹麦形成了共同劳动力市场,1954年发展为北欧劳动力市场,扩大到瑞典、丹麦、挪威和芬兰。从此后,丹麦、挪威和芬兰人可以自由地到瑞典工作和生活;1950年代瑞典的劳工移民招募扩大到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希腊和匈牙利等国家,甚至在短期内还从西德和荷兰招募劳工;1964年瑞典取消对南斯拉夫劳工移民的签证要求;1966年瑞典和南斯拉夫签订劳工协定;1967年与土耳其签订类似协定;尽管由于经济衰退,1966—1968年瑞典试图控制移民,但是北欧劳工移民不在此列;1968—1970年瑞典经济的复苏与繁荣导致入境移民空前高涨;1970年移民几乎达到瑞典人口的1%。^①

1970和1980年代,瑞典加强了移民限制。1971—1973年的经济衰退迫使政府在1972年停止了劳工招募。1976年瑞典政府取消了与意大利和土耳其的劳工协定。1980年侨民法宣布,外国移民在进入瑞典之前必须获得居留许可和住房安排;只有存在瑞典本国劳动力不能承担的工作的情况下才发放居留许可;移民的工资和工作条件不得优于本地劳工等。在1980—1984年间,瑞典失业率居高不下,为此1985年议会通过了《移民改革法》,加强了对外来移民的控制。^②作为劳工引进的移民减少了,但是那些在此前进入瑞典的移民的亲属在家庭团聚政策下不断进入瑞典,成为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③1970年代中期以后,难民逐渐成为瑞典移民的主要部分。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早期,每年到瑞典寻求避难的人数在一万到三万之间。^④最近的难民潮发生在1992—1994年,当时瑞典为从前南地区逃出来的十七万人提供了避难。^⑤

大量移民的到来使瑞典第一次出现了少数民族问题,^⑥民族文化多样性逐步形成,并成为瑞典社会的重要特点,引起广泛关注。1975年,瑞典820万总人

① Eytan Meyers, op. cit., pp. 149—151.

② Ibid., pp. 158—160.

③ Susan Opper, "Multiculturalism in Sweden: A Case of Assimilation and Integrati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1983, Vol. 19, No. 2(Special Number 7 : Education and Diversity of Cultures), pp. 195—196.

④ Bastian Vollmer, "Immigration Policy in Sweden", http://www.emzberlin.de/projekte_e/pj32_1pdf/MigPol/MigPol_Sweden.pdf, 18/07/06.

⑤ Toros Korkmaz, *Comparison of Swedish and German Immigrant Integration Policies within the Light of the European Union Framework* (Master Thesis), Linköping University, 2005, p. 11.

⑥ [瑞典]斯·哈登纽斯:前引书,第91页。

表 1 1979 年瑞典移民构成情况(单位:人)^①

移民总数	37400		
移民 来源 构成	世界其他地区的瑞典人	5000	
	斯堪的纳维亚移民	16200	
	非斯堪的纳维亚移民 16200	其中:家庭团聚移民	9000
		难民	3650
		劳工移民	1450
		瑞典人收养的儿童	1300
		留学生	800

口中有 55 万人出生于其他国家(不包括移民的第二代即移民在瑞典所生的子女)。^③ 1970 年代后半期,瑞典的移民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难民和家庭团聚移民使得 1970 – 1978 年间非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移民在移民总数中的比例增加了三倍。^④ 1979 年,瑞典的斯堪的纳维亚移民为 1.62 万,还是占很大比例,其中芬兰人最多,为 1.25 万。但非斯堪的纳维亚移民也占了很大比例,达到 1.62 万,与斯堪的纳维亚人持平(见表 1)。总体来说,在瑞典定居的外国人的来源已经相当广泛。1980 年左右,瑞典的移民来自 130 多个不同的国家,在瑞典出生的儿童中大约 15% 的父

母至少有一方出生在国外,第二代移民中超过 1/3 的人的父母都出生在国外。^⑤ 1979 – 1980 年,在人数居于前十二位的移民群体中,除了北欧的芬兰、挪威和丹麦外,南斯拉夫、希腊、土耳其、波兰和意大利等东南欧国家的比例有所上升;南美的智利人也进入了前列(见表 2)。

表 2 1979 – 1980 年在瑞典外国公民的民族背景^②

国别	人数(人)	国别	人数(人)
芬兰	186731	波兰	9897
南斯拉夫	39825	英国	8777
丹麦	30650	美国	7252
挪威	26505	智利	6435
希腊	16575	意大利	5138
土耳其	16206	其他	55585
西德	14898	总计	424113

① Susan Opper, op. cit., p. 196.

② Ibid., p. 197.

③ Ibid., pp. 195 – 196.

④ Ibid., p. 196.

⑤ Ibid., p. 202.

来源广泛的移民在瑞典定居,语言多元化成为民族文化多元化的重要标志。除了瑞典语外,在瑞典使用较多的语言有芬兰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希腊语、拉普兰语、爱沙尼亚语、西班牙语、波兰语、匈牙利语、土耳其语和意大利语等。当然还有英语,从1940年代中期开始,瑞典就逐步形成了英语与瑞典语并行的双语格局。1980年,大约六万有外国背景的儿童与青少年在家庭里和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是非瑞典语。1975—1979年,处在义务教育阶段的移民学生(包括第二代移民和出生在外国的人口)从3万上升到近9万。1979年在100多万接受义务教育的注册在校的学生中,8.2%在家里使用的是瑞典语以外的其他语言。^①

历史上,绝大多数瑞典人信奉路德教。战后移民的到来使瑞典的宗教信仰呈现出多样性,除路德教外,随着南欧和东欧移民的到来,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信徒也越来越多,其他基督教派别也有一定的存在。更为突出的是,世界上其他主要宗教如伊斯兰教和佛教等也扎根于瑞典社会。198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9%的瑞典人认为自己是严格的基督徒,64%的人认同基督教,26%的人认为自己不是基督教徒。今天瑞典大约有1.6万名犹太教徒;13万穆斯林,其中大多来自土耳其、中东和北非;还有大约3千名佛教徒和大约同样数量的印度教徒。^②

二战后移民的大量进入、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逐渐形成和发展使瑞典单一的民族文化格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应对日益复杂的民族文化多样性,如何处理移民与少数民族问题成为瑞典政府和民众面临的重大课题。

二 多元文化政策的出台

战后初期,对于外来移民,瑞典的态度和立场十分明确,就是要求移民成为瑞典人,采纳瑞典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融入瑞典社会。1945年瑞典外交部长昆斯藤·昂顿(Osten Unden)宣称,官方以同化主义政策来处理移民问题。1946年1月,昂顿在议会谈到在二战结束之际来到瑞典的大约三万波罗的海人时认为,如果他们选择继续留在瑞典的话,就必须成为瑞典人,像瑞典人那样生活。^③

① Susan Opper, op. cit., p. 202.

②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Sweden”, http://www.randburg.com/sw/general/general_6.html. 16/0706.

③ Harald Runblom, “Swedish Multiculturalism in a Comparative European Perspective”, p. 629.

同化成为处理外来移民的根本方式。而且 1965 年以前,政府没有采取任何专门措施来帮助移民适应瑞典社会,仅仅是希望他们自觉地同化。

但是人们逐渐发现,移民同化并非易事。那些早期来自中欧和西欧工业化国家和城市的移民,由于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生活方式类似而易于同化。^①而那些在 1960 年左右到达的移民主要来自土耳其、希腊的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低,与瑞典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差距较大。同化政策对这些移民群体而言没有作用。从经济角度看,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前半期瑞典经济空前繁荣。^②没有这些移民,瑞典就不可能取得破纪录的经济成就。而随着经济增长率的空前提高和国际贸易的稳步扩大,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日益严重,成为最大的制约因素。为了保证经济的持续繁荣,从其他国家吸收相当人数的劳动力移民势在必行。^③于是,对劳工移民的需求与既定的同化政策之间形成了矛盾。因此在继续需要外来移民来促进瑞典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寻求取代同化政策的新方法从而把外来移民融合进瑞典社会就显得非常重要。

与此同时,芬兰政府也要求瑞典对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保持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与政策。战后,芬兰成为瑞典劳工移民的主要来源地。芬兰政府视人口外流为国家的重大损失,千方百计地吸引在瑞典的芬兰人回国。在瑞典的芬兰人能否保持自己的语言显得特别关键,因为对自己国家的语言和文化保持得越好,重返家乡的可能性就越大,重新融入芬兰社会的能力就越强。为此芬兰政府利用北欧劳动力市场对瑞典施加压力,要求瑞典进行国内的语言教育改革,以促进芬兰人的语言和文化保持。^④芬兰政府的压力促进了瑞典移民与少数民族政策的改变与多元文化教育的实施。而一旦瑞典政府给予了芬兰人文化权利,其他族群的移民就有理由要求同样的权利,^⑤为此瑞典政府也不得不把同样的权利扩大到其他的外来移民。

因此,1960 年代瑞典出现了由同化政策向多元文化政策转变的迹象。人们也越来越关注外来移民在瑞典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政府开始组建相关机构调查和研究移民问题。1965 年成立的关于移民政策的专门小组提出,为促进移民融

① Harald Runblom, op. cit., p. 629.

② [瑞典]斯·哈登纽斯:前引书,第 91 页。

③ Harald Runblom, op. cit., p. 630.

④ Christine Inglis, op. cit., p. 45.

入社会,应向移民提供资助,给予移民免费的瑞典语培训,编写和发放介绍瑞典社会状况和移民权利与义务的宣传材料。1961年组建的侨民委员会(1961—1968年)对移民法、移民管理和移民控制等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①根据这些研究和建议,1966—1968年间,瑞典议会提出了一些关于移民教育和文化保持的提案。他们意识到,政府应该对那些在瑞典工作并决定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外来人口的福利和幸福担负起道义和责任。^②

1968年瑞典废除了侨民委员会,建立移民委员会。该委员会存在了六年之久,在多元文化政策的形成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它调查移民在瑞典遇到的问题,对政府的移民政策进行评估,对移民与少数民族团体的要求和愿望进行调查,对移民与少数民族保持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的要求进行考察和研究,先后提交了四份报告,提出了一系列解决移民与少数民族问题的新措施。移民委员会的建议在1975年为议会采纳,并确立为法律,从而奠定了瑞典处理移民和少数民族政策即多元文化政策的基础。^③其主要内容包括:

1. 平等、选择自由和伙伴关系

1975年瑞典议会将多元文化政策的基础归纳为三条基本原则:平等、选择自由和伙伴关系。平等原则意味着瑞典政府给予移民与其他瑞典人一样的生活水平。早在1967年,当移民控制加强和要求工作许可的时候,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就提出有必要确保移民获得平等待遇。事实上在1960年代末的时候,平等就已经成为瑞典移民政策的基本目标;^④选择自由表明政府将采取措施确保定居在瑞典的族群与语言少数民族拥有真正的选择自由,他们有权在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文化认同和采纳与接受瑞典的文化认同之间做出自己的抉择,也就是说他们可以选择成为“瑞典人”,也可以选择把他们与生俱来的文化特性与瑞典社会文化结合起来;伙伴关系则表示不同的移民和少数群体为一方,瑞典本土人口为一方,两者相互合作,共同受益。^⑤这三项原则成为瑞典多元文化政策的标志,是瑞典政府处理主流社会和移民与少数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

^① Tomas Hammar, “Immigration Research in Swede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14, No. 1, Spring 1980, p. 98.

^② Harald Runblom, op. cit., pp. 634—635.

^③ Tomas Hammar, “Immigration Research in Sweden”, p. 98.

^④ Tomas Hammar, *European Immigration Policy: A Comparative Study*, p. 34.

^⑤ Ibid., p. 33.

2. 文化保持

移民保持自己文化的权利得到政府的资助和法律的保护。语言是文化多样性的表现,也是保持多元文化的载体。1967年,政府开始资助出版讨论移民问题的杂志。杂志以英语、法语、波兰语、西班牙、捷克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和德语等多种语言同时发行。1968年,移民儿童获得每周至少两小时的母语学习权利。^① 1974年,政府对那些希望自己语言、宗教和文化的移民群体给予资助,资助以移民语言出版的期刊,在公共教育系统内实施移民母语培训。^② 1976年,瑞典实施帮助移民子女接受母语教育的计划,资助移民和少数民族组织,建立移民事务咨询理事会。^③ 移民和少数民族可以组建自己的移民协会,政府有义务帮助他们建立和维持这些团体和组织。^④ 移民协会可以组织自己的文化活动。这种协会一般都有固定的活动场所,每年可向政府申请活动经费。为满足移民的文化需求,政府购买了大量移民语言的书籍,收藏于瑞典的公共图书馆。图书馆还有不同国家出版的报纸。广播和电视也定期用不同语言播出。^⑤

3. 社会参与

帮助和促进移民参与瑞典社会、确保他们获得平等的机会与待遇是多元文化政策的基本目标和重要内容。为此瑞典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解决移民参与瑞典社会的语言问题。1965年,政府为所有移民免费提供夜校形式的瑞典语培训。1971年后开始为移民提供翻译服务。移民人口集中的社区都设有专门的“移民服务机构”,以移民语言向移民群体提供特别服务。1972年政府颁布法律规定,赋予移民在工作时间内拥有获得240小时带薪的免费瑞典语培训的权利。

二是给予移民相应的政治权利。1969年,政府将来自北欧国家的移民成为瑞典公民的最短居留期限由原来的5年减为3年,而其他非北欧移民的最短居留时间依然是7年。^⑥ 1976年进一步缩短:非北欧移民由7年缩减为5年,北欧

① Toros Korkmaz, *op. cit.*, pp. 54–55.

② Harald Runblom, *op. cit.*, pp. 630–631.

③ Eytan Meyers, *op. cit.*, p. 158.

④ Tomas Hammar, *European Immigration Policy: A Comparative Study*, p. 35.

⑤ 章念生:“瑞典尊重移民的文化习俗免费教移民瑞典语”,《环球时报》1998年9月8日。

⑥ Eytan Meyers, *op. cit.*, p. 151.

移民由 3 年缩减为 2 年。^① 1975 年瑞典授予所有在瑞典居留满三年的外国公民参加地方选举的权利。^② 移民可以以个人或者集体的身份参加工会和政治活动。^③

三是给予移民同样的福利待遇。社会福利部门、儿童和孕妇照料中心、医院为移民和瑞典本地人提供同样的服务。^④ 只要缴纳够至少 12 个月的失业保险金, 移民在失业的时候就可以得到失业救助。移民拥有和瑞典人一样的获得国家就业服务机构的服务和职业培训的权利。^⑤

4. 多元文化教育

教育成为瑞典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重要内容, 成为融合移民的重要手段和途径。1974 年政府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移民教育的工作组。1976 年 5 月, 议会将工作组的建议确定为法律, 对移民教育做了具体规定。

学前教育, 规定学龄前儿童, 无论是否出生在瑞典, 都有资格在 6 岁以前获得学前教育机会, 移民子女有权获得母语教育。

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分为三种模式, 一是移民学生与瑞典学生一起学习。主要教学语言是瑞典语, 每周给移民学生进行 2 - 4 小时的母语训练; 二是同语言的移民学生一起学习, 主要教学语言是母语; 三是同语言的移民学生与瑞典语学生联合组成班级, 专门由懂移民语言的老师来教授移民学生。

成人教育, 给那些不适合参加义务教育的成人提供瑞典语言培训、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培训。^⑥

综上所述, 出于经济和外交等因素的考虑, 针对移民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需要, 1975 年瑞典政府推出多元文化政策, 形成了一套以民主的方式处理移民与民族和文化多样性问题的政策体系。由同化政策到多元文化政策的历程成为瑞典移民与少数民族政策的根本性转变, 标志着瑞典社会变得更加开放、民主和宽容。

① Eytan Meyers, op. cit., p. 158.

② Harald Runblom, op. cit., p. 631.

③ Tomas Hammar, *European immigration policy: A Comparative Study*, p. 35.

④ Ibid., p. 37.

⑤ Ibid., p. 36.

⑥ Susan Opper, op. cit., pp. 205 - 206.

三 多元文化政策经受考验

瑞典的多元文化政策在 1970 年代初之所以能够顺利产生,原因在于当时的瑞典社会存在着一些有利的历史背景。

第一,当时的瑞典经济繁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居全球前五位。^① 高涨的经济和很低的失业率对实施宽容的多元文化政策提供了支撑。

第二,瑞典的多元文化政策是针对随着战后劳工移民的到来而形成的民族文化多样性而实施的。战后移民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劳工移民,从 1940 年代后期到 1970 年代早期为了满足劳动力短缺而大量招募而来;二为难民,从 1970 年代中期到今天,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瑞典吸收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早期的劳工移民对瑞典经济发展的贡献远远大于瑞典社会给予他们的好处,多元文化政策就是以劳工移民及其后代为目标群体。^② 1970 年代,通过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移民每年可以为瑞典增加 60 亿瑞典克朗的国库收入。^③

第三,当时瑞典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是有限的。1968—1970 年间到达瑞典的近 17 万移民中,10 万多来自芬兰,1.4 万来自其他的北欧国家;1967—1973 年归化入籍的外来移民中,50—71% 具有北欧血统,70—87% 具有西欧血统。^④ 移民主要来自欧洲和北美,绝大多数移民具有与瑞典人相同的民族文化背景,有着共同的基督教文化传统(除了少数的土耳其人和南斯拉夫人外)和欧洲的价值观念。多元文化政策就是在这样的民族构成背景下出台的。当时,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公众都没有预料到后来非欧洲和非基督教移民会大规模涌入。^⑤

正因为如此,在后来的发展中,瑞典的多元文化政策不断面临着经济波动和越来越复杂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严峻考验。

首先,当经济波动、失业率高的时候,移民往往成为最大的失业群体,多元文

① Harald Runblom, op. cit. , p. 634.

② Ibid. , p. 634.

③ Lars Jedrlund, Victor Kayfetz, "In Transition: From Immigration Policy to Integration Policy in Sweden", *Scandinavian Review*, http://www.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qa3760/is_199904/ai_n8835546.15/07/06.

④ Eytan Meyers, op. cit. , p. 154.

⑤ Harald Runblom, op. cit. , pp. 633—634.

化政策往往成为攻击的对象。大约 1975 年以后,瑞典经济开始面临困难,经济增长在 1980 年代初趋于停止。年轻移民的失业率高达 10% 左右。^① 在 1980 年代的瑞典经济衰退时期,大量的移民逐渐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以外,这种情况在 1990 年代初达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非欧洲移民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如 1980 年代中期瑞典的伊朗人失业率高达 50% (见表 3)。^② 而在前南斯拉夫内战中逃往瑞典的波斯尼亚人,虽然与伊朗人一样是穆斯林,但由于是欧洲人的缘故,就业状况就要稍好一些。瑞典民众对非欧洲人有着难以消除的偏见,他们宁愿与欧洲(包括东欧)血统的移民一起工作,而不愿意与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共事。^③ 加之,1990 年代通过社会援助、住房补贴和失业救济等瑞典政府每年给予移民的补助达 200 亿瑞典克朗。^④ 因此,瑞典一些政党也开始质疑多元文化政策,如新民主党认为这些政策实施的成本太大。^⑤

其次,1980 年代以来,随着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日益复杂,瑞典社会产生了种族排外思想和运动,对多元文化政策构成严重挑战。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大规模的非欧洲难民涌入瑞典。1986 年来自亚洲、拉美和非洲的移民第一次超过了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移民。^⑥ 1990 年瑞典有 48.4 万外来定居者,占瑞典总人口的 5.6%,其中 18.5 万来自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尤其是芬兰)。其他的非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

表 3 1993 年瑞典移民的失业率(%)^⑦

性别	男	女
瑞典总人口	9.7	6.6
外国移民	24.0	17.0
芬兰人	16.5	8.9
丹麦人	7.7	11.6
挪威人	19.6	7.9
南斯拉夫人	19.3	18.7
伊朗人	52.3	55.5
土耳其人	24.2	24.1
智利人	30.2	38.1
波兰人	27.1	27.2

移民则依次为:南斯拉夫移民 4.1 万、伊朗移民 3.9 万、土耳其移民 2.6 万、智利移民 2 万。还有许多移民已经成为瑞典公民,1986 年,瑞典总人口中具有移民

① Eytan Meyers, op. cit., p. 23.

② Harald Runblom, op. cit., p. 634.

③ Eytan Meyers, op. cit., p. 163.

④ Lars Jedrlund, Victor Kayfetz, op. cit..

⑤ Harald Runblom, op. cit., p. 634.

⑥ Ibid., p. 635.

⑦ Eytan Meyers, op. cit., p. 161.

背景者为 92 万, 约占总人口的 11%, 其中有 25 万是在瑞典出生的移民第二代。^① 1992 年, 瑞典移民主要来自前南斯拉夫地区, 同时也有来自非洲、亚洲和其他非欧洲地区的移民。1993 年在瑞典接收的近 6 万移民中, 来自非北欧国家的占了一多半, 其中 40% 来自欧洲以外的地方。^② 简言之, 近些年, 瑞典社会中具有移民背景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日益增加, 移民的来源日益广泛。

由于非欧洲和非基督教背景的移民的逐渐增加, 仇外思想和运动随之出现, 种族排外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1987 年, 瑞典南部的舍布市 (Sjöbo) 政府拒绝参加难民安置计划。1988 年, 舍布就这一问题举行了一次地方全民公决, 结果大约 65% 的人投票反对接收难民。1988 年瑞典民主党成立, 宣扬“瑞典人的瑞典”, 反对外来移民。1991 年 2 月, 新民主党成立, 7 个月后该党获得 25 个议席, 以 6.7% 的选票进入议会, 随后便提交了反对外国人的法案, 要求取消移民接受母语教育的权利。1991 年又出现了两个反移民组织, 舍布党 (the Sjöbo Party) 和纳粹白色雅利安抵抗组织 (Nazi White Aryan Resistance)。

面对反移民的排外浪潮, 瑞典政府一方面加强了移民入境控制, 紧缩难民政策, 如 1989 年 12 月颁布侨民法和侨民条例, 严格难民资格审查条件; 1990 年 1 月, 瑞典政府决定驱逐 5 千余名具有土耳其血统的保加利亚难民, 理由是保加利亚的政治形势改变了, 民主制度正在建立。同年, 瑞典宣布拒绝接收来自东德和波兰的寻求庇护者。^③ 另一方面政府继续善待生活在瑞典的具有移民背景的居民, 如 1986 年瑞典政府重申多元文化政策的基本原则, 并采取了以下措施, 以继续推进多元文化政策的发展:

首先, 预防和抵制种族歧视。1986 年, 政府任命了专门负责处理反种族歧视事务官员, 设立了反种族歧视官员办公室, 其任务和职责是就所有关于种族歧视和与移民及难民相关的问题向政府提出建议。凡是因种族、肤色、民族背景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而遭遇不公正待遇和虐待者都可以向反种族歧视官员办公室投诉。^④ 政府和议会还进行了反歧视立法。1986 年, 瑞典实施相关法律, 以消除

^① Stephen Castles, “Book Reviews, ‘Paradoxes of Multiculturalism: Essays on Swedish Societ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27, No. 2, Summer 1993, p. 439.

^② Christine Inglis, op. cit., p. 44.

^③ Eytan Meyers, op. cit., pp. 161 – 162.

^④ Bastian Vollmer, “The Politics of Integration in Sweden”, http://www.emz-berlin.de/projekte_e/pj32_1.pdf /IntPol_Sweden.pdf 15/03/06.

移民在劳动力市场遭遇的歧视。1994年反歧视法得到加强,反种族歧视事务官员的地位得到提高。此外,反民族歧视事务官员还致力于解决其他公共生活中的种族歧视问题。^① 1999年,政府实施了《关于在工作环境中防止种族歧视的法案》。2002年3月1日,为杜绝高等教育领域的种族歧视,议会通过了《关于在高等教育中平等对待学生的法律》。

其次,实施融合政策以推进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瑞典政府积极组织研究和咨询机构对移民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积极寻求解决之道。1994年11月,政府建立了两个新的委员会。其一负责评价移民与难民政策,其二是评估多元文化政策。它们于1996年向政府提交了研究报告。^② 根据报告建议,1997年议会批准政府提出“未来与多样性——从移民政策到融合政策”的法案,正式宣布实施融合政策。

融合政策的基本原则和目标包括,无论民族或者文化背景如何,所有人在权利、责任和机会上一律平等;建设一个民族文化多元的社会;创造一个相互尊重和宽容的社会,其中的每个人无论背景如何都能够积极地融入社会并担负相应责任;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移民的需求应和其他公民一样,受到一视同仁的考虑。融合政策的出发点是,普遍的社会政策应该建立在民族与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鼓励移民自立,参与社会事务;捍卫基本的民主原则,致力于男女机会平等;预防和消除种族歧视、排外情绪和种族主义。

为了实施融合政策,1998年瑞典融合委员会(The Swedish Integration Board)建立,其任务是引导新到达的难民适应瑞典社会,促进融合过程,监控瑞典社会各领域融合政策实施的状况和进展。^③ 政府要求社会各个阶层和各部门都参与融合政策,在住房、就业、教育和社会福利等各方面关注移民的需要,保护和促进多元文化。

第三,克服种族主义和排外情绪。1990年代早期,许多瑞典城市的种族排外情绪高涨,在斯德哥尔摩,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团体在市区相互攻击。面对这种情况,1992年斯德哥尔摩市专门拨款400万瑞典克朗实施特别计划,以

① Lars Jedrlund, Victor Kayfetz, op. cit..

② Christine Inglis, *Multiculturalism: New Policy Responses to Diversity*, p. 46.

③ Fact sheet produced by the Ministry of Industry, Employment and Communications (Article No. 2002.038), “Swedish Integration Policy for the 21st Century”, Stockholm: Print XBS Grafisk Service, 2002.

克服排外情绪和促进良好的族际关系。1993 年夏天,瑞典西部的特罗尔海坦市 (Trollhattan)发生种族冲突,来自索马里的移民遭到种族主义组织的毒打,排外主义的政党——瑞典民主党的青年支持者们烧毁了当地的清真寺。为此,特罗尔海坦市政府与警察、教会、非政府组织进行密切合作,共同消灭排外情绪和种族主义。针对青少年的排外情绪,国家通过立法规定,在学校穿戴带有种族主义标志的衣服和传播种族主义思想属于非法行为。新法律把这类行为定义为“种族煽动罪”,最高可处以两年监禁。1997 年初关于瑞典青年人如何看待纳粹大屠杀的调查报告表明,许多年轻人对大屠杀表示怀疑。这引起了政府的警觉。1997 年 6 月,政府实施全国性重温历史计划,以八种语言出版有关 1933—1945 年大屠杀历史的书籍——《告诉你的孩子》,对民众进行广泛教育。1998 年 11 月瑞典首相约兰·佩尔松 (Goran Persson) 在议会宣布,应把反对种族主义和排外情绪作为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纳粹、法西斯和种族主义不可容忍。我们有责任不对此保持沉默。”^①

政府一贯致力于创建多元文化社会的和谐与平等。为进一步促进瑞典多元文化的发展,促进不同文化与民族背景人们的理解与尊重,2003 年瑞典政府宣布 2006 年为瑞典“多元文化年”。^②

面对经济波动和日益复杂的文化多样性的考验,瑞典政府和议会于 1997 年正式宣布实施融合政策,公开宣布建设一个宽容的多元文化社会,在要求外来移民对瑞典承担共同的社会责任的基础上,促进移民和少数民族充分地参与社会,享受社会福利,创造社会平等。虽然没有使用“多元文化政策”这个术语,但从其原则和内容看,融合政策继承了 1975 年多元文化政策的基本原则,标志着瑞典多元文化政策的发展。

四 对多元文化政策的评估

当今世界,文化多样性已经成为与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并称的时代特征。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多元文化的社会,“几乎没有哪

^① Lars Jedrlund, Victor Kayfetz, op. cit..

^② Svensk Information, *Agenda for culture 2003 – 2006*, Edita Västra Aros, Sweden 2003.
<http://www.sweden.gov/content/1/c4/35/78/080a9932.pdf>. 13/07/06.

个国家是由完全单一的民族构成的。世界上近 200 个国家共包括了 5000 个民族团体,其中有 2/3 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一个至少占人口 10% 的民族或者宗教团体。”国际移民的加速使得“如今每个国家都或多或少都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以共同的传统、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为纽带形成力量不同的民族、宗教或语言群体。”^①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已成为全球性难题。

在这种背景下,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作为当代西方关注民族文化多样性、主张尊重文化差异和文化权利、倡导多元文化平等共存、追求社会和谐的重要思潮而出现。它最早产生于 20 世纪 50 到 60 年代的美国和加拿大,70 年代初被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瑞典确立为国家政策。冷战结束以来,多元文化主义成为一种普遍的西方社会思潮。

关于多元文化主义,尚无一致的定义,但一般来讲,它应该包含这样几层含义。首先,它指一个国家/社会的人口、民族(族群)、宗教、语言等的统计学特性,指多文化、多语言、多宗教和多民族这种社会现象,即多元文化社会;其次,它指西方国家处理民族文化多样性、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政策,即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作为一项政策,它指政府为谋求民族、宗教或语言方面的少数群体对公共领域的参与而设计的旨在处理民族、文化多样性问题的一系列方针、原则和措施;再次,它指西方社会兴起的与同化主义相对立的处理民族文化多样性问题的理论体系,即多元文化主义思潮。作为一种思潮,它指的是对不同民族、文化群体希望得到承认的诉求给予充分肯定的思想理论,其核心要求是社会承认和平等。一般而言,多元文化社会现实导致了多元文化主义思想的产生,在多元文化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有的国家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但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种国家政策并不一定在所有可以描绘为多元文化的社会出现。^②

二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大量移民涌入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欧洲特别是西欧成为国际移民的重要目的地。欧洲国家的民族文化状况发生了重大改

^①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4 年人类发展报告——当今多样化世界中的文化自由》,本书翻译组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 页。

^② 杨洪贵:“多元共存,和谐共处——试论多元文化主义”,《新疆社会科学》2006 年第 3 期。

变,“德国有很多新移民,比如土耳其人;法国有许多阿拉伯人。”^①在以德意志民族为核心的德国8200万人口中,有9%即740万人是外国人;以法兰西民族为自豪的6100万总人口中,外国人为430万人;而瑞典880万总人口中170万“有外国背景”(即外国移民及其子女),占其总人口的19.3%。^②移民带来的社会变迁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现在移民问题已经成为欧盟成员国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③如何把移民融合进主流社会,如何处理民族文化多样性问题显得非常迫切。

但欧洲国家或多或少地存在一种下意识的倾向——忽视移民对人口和文化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影响。^④欧洲各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多元文化社会,但并不是所有国家对民族文化多样性都持欢迎态度,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接受多元文化主义思想,采取多元文化政策来处理民主文化多样性问题。在这方面,瑞典和德国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典型。两国对于民族国家的理解不同,一个实行封闭的排他主义政策,一个是实施以民主方式认可与接纳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多元文化政策。

德国是根据共同的血统、语言和文化来定义民族国家的,公民地位的获得以“血统”或族源为基础。这意味着把少数民族排斥在公民和民族共同体之外。^⑤主体群体不愿接受移民及其子女成为民族的成员。这种不情愿表现为,排斥性的移民政策(尤其是限制家庭团聚移民和拒绝给予永久居留地位)、限制性的人籍政策以及不愿意把自己定义为移民国家。移民可以进入社会的某些领域——主要是劳动力市场,但是被拒绝进入其他领域,如社会福利、公民身份和政治参与。移民以工人、消费者和父母等身份成为社会的一部分,但无法充分参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⑥在德国公民资格只给予那些具有德国血统的人。

① 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4—355页。

② 宋全成:“欧洲的移民问题与欧洲整合——以德国为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③ Barbara Melis, *Negotiating Europe's Immigration Frontiers*, Bost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1, p. 1.

④ Harald Runblom, op. cit., p. 624.

⑤ Toros Korkmaz, op. cit., p. 11.

⑥ Stephen Castles and Mark J.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1998, pp. 244—245.

因此,即使是在德国出生的、母语已经是德语的第三代土耳其人也无法获得德国公民权,而一位来自前苏联地区的日耳曼人,即使从来没有在德国生活过、不懂德语也可以很快获得德国公民权。^①

而瑞典却以更为自由和民主的多元文化主义来处理民族文化问题。与德国把国家定义为以共同的血统、语言和文化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不同,瑞典与其他多元文化国家一样,把民族/国家定义为建立在宪法、法律和公民身份之上的政治共同体。只要外来移民认同和接受这些政治规则,民族/国家就可能接纳他们为共同体的成员,同时认可和接受文化差别与族群社区的形成。^② 多元文化主义成为给予移民保持和发展他们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机会的前提下、整合来源多样的移民进入主流社会的政策体系。其目标是在保护民族多样性的同时促进政治统一,其追求的理想状态是来源多元的个人与群体和平共存。^③

德国与瑞典的差别在本质上是一个接纳与排斥的问题,是一个在多大程度上接纳的问题,与此相应,在现代公民社会里,移民融合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否给予移民公民地位以及在何种前提条件下给予公民地位的问题。因为在现代民主的公民社会里,公民地位是一国居民充分参与社会和享受权益的基本前提。在排他主义政策模式下,存在严重的文化排斥(包括生活方式排斥和参与排斥)。而多元文化政策则以解决文化排斥为目标,认可文化包容和社会参与,促进多元文化社会不同民族文化的和谐共处。^④

在西欧国家尚不愿像加拿大那样明确地宣布自己为多元文化社会的时候,瑞典早在1975年就推出了多元文化政策,成为继加拿大(1971年)和澳大利亚(1973年)之后最早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国家之一。但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相比,瑞典多元文化政策产生的背景有所不同。按照民族文化多样性形成的过程,多元文化国家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国家存在世世代代居住在固定地区、历史久远的少数民族,如瑞士和1991年前的南斯拉夫;第二类国家建立在大规模现代移民的基础上,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第三类国家,大规模移民对他

^① Managemen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s (MOST), *Multiculturalism: A Policy Response to Diversity*, UNESCO 1995, <http://www.unesco.org/most/sydpaper.htm>. 16/6/06.

^② Stephen Castles and Mark J. Miller, op. cit. , p. 42.

^③ Harald Runblom, op. cit. , pp. 623 – 624.

^④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引书,第27 – 47页。

们来说还是二战后才出现的新现象,如瑞典和其他西欧国家。^① 瑞典是第三类国家的代表,是世界上最早实施多元文化政策的国家之一,也是欧洲最早实施多元文化政策的国家。在战后移民导致的民族文化多样性日益成为多数国家不得不面对的社会现实的西欧,瑞典的实践不仅对本国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而且为面临同样问题的国家提供了处理移民与少数民族问题的新模式,并成为欧盟移民融合政策的先导。

对于瑞典来说,由同化政策到多元文化政策的过渡可谓是 180 度的大转变。^② 它标志着瑞典政府处理移民与少数民族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有着重大的意义。首先,多元文化政策的实施有利于促进瑞典经济发展。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瑞典输入了大量劳工移民从而形成了民族文化多样性。多元文化的人口成了经济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条件,但也构成了对同化政策的重大挑战,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传统的移民和少数民族政策之间形成了尖锐对立。多元文化政策的重大意义在于解决了上述对立,不仅有利于招募来源广泛的移民劳工,同时有利于有效地利用外来移民的技能与智慧服务于瑞典经济。其次,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多元文化政策认可和鼓励多元民族文化,一视同仁地对待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其结果“使那些以他们自己的文化为荣,并希冀他们的文化得到国家认可的人们,急于加入其他文化群体的人们组成的公民团体来能够捍卫自己的自由和宽容的形象。乡土情结和差异意识的增强反而鼓舞了他们对国家目标和体制的认同。”^③因此,多元文化政策有利于突破单一民族国家内本民族人口与外来人口之间在权利上的明显界限,促进了移民与少数民族的平等,创造了民族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这有利于促进多元文化的人口之间在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学习和借鉴,促进多元文化人口走出自己文化的狭隘天地,认同并参与移入国以主体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共同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在对移入国发展承担共同责任的前提下,多元文化政策有利于在政治上对那些愿意把忠诚和智慧献给这个国家的外来人口实现融合。

事实上,瑞典的多元文化政策为欧洲各国树立了榜样,并成为欧盟统一的移

① Harald Runblom, op. cit., p. 636.

② Ibid., p. 629.

③ [英]C·W·沃特森:《多元文化主义》,叶兴艺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 页。

民融合政策的样板。1990年代以来,在移民融合受到欧盟成员国共同关注的情况下,为了促进各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协调,欧盟在超国家层次上形成了接纳和融合移民的基本政策。

2003年欧盟委员会认为,移民融合是一个合法移民和主流社会之间相互承担责任与义务的双向过程。一方面,主流社会有责任确保移民的正当权利得到保障,移民个人有机会参与主流社会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另一方面,在不必放弃他们自己的传统和文化的前提下,移民应该尊重主流社会的道德观念与价值准则并积极地参与融合过程。委员会确定的移民融合政策的基本原则为,尊重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移民有权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与欧盟公民一致的权利和义务;在平等基础上(包括平等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公民的基础)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①

欧盟政策的基本原则与瑞典实施多年的政策原则相一致。欧盟统一的移民融合政策成为各国接纳与融合移民的政策基础,从这个角度看,瑞典是欧洲的特例,它不像其他多数移民国家那样被动地接受与自己以往政策不同的欧盟移民政策。它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可以说是欧洲移民融合政策的榜样。

当然,作为一种新的处理民族文化多样性问题的政策模式,瑞典的多元文化政策也并非一帆风顺。1980年代以来,瑞典不断面临经济波动的困扰,非欧洲和非基督教难民大量涌入,民族文化多样性日益复杂,对瑞典多元文化主义构成严峻挑战。一些极端势力和组织出现了,他们反对外来移民,反对多元文化政策,试图回到过去。但瑞典政府和议会继续坚持和发展多元文化政策的基本原则,并在1997年宣布实施融合政策,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消除种族主义和排外势力,维护移民和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地位,促进社会平等与和谐。瑞典的实践说明,在民族文化多样性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社会特征的国家里,以民主的方式处理民族文化问题、促进民族平等和社会宽容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作者简介:杨洪贵,重庆文理学院副教授;责任编辑:彭姝祎)

^① EC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on Immigration, Integration and Employment*, Brussels, pp. 17–18.

76 Parliamentary Supremacy or EC Law Supremacy? – Conflict between Principle of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and Supremacy of EC Law

LI Jingkun

The principle of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is always regarded as the cornerstone of British constitutional system, which means that British parliament composed of the Crown and the House of Lords and the House of Commons, is the sole and ultimate source of power to make and unmake any law whatever, and that no person or body is recognised as having a right to override or set aside the legislation of Parliament. This position of supremacy is recognised and applied by the courts. However, since the UK joined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 1973, it must accept such principles like direct effect and supremacy of EC law, and limit its power of law-making in Parliament. Therefore, within the field where the EC law applies, parliamentary acts have ceased to be the highest law of the country, and which resulted in significant changes to the principle of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and in the relocating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different state institutions, especially between the parliamentary and the judiciary. This change will have great influences to British constitutional system.

91 Evolution of Relation between the Courts and Parliamentary Privilege in the UK

TONG Jianhua

As a part of acts and customs of British parliament, parliamentary privilege has important position in British co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 system. Parliament has alleged that it has the right to determine the scope of parliamentary privilege and the matters concerning parliamentary privilege. Yet, there are lots of controversies on the existence of privilege and exclusive jurisdiction of proceedings between the courts and Parliament. The courts' avoidance and review against the matters concerning parliamentary privilege coexi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n law in Britain.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n law, the courts have more right to review parliamentary privilege in some aspects.

105 A Tentative Study of Swedish Multicultural Policy

YANG Hong-gui

As a consequence of postwar immigration, Sweden has gone through a transformation from an ethnically and culturally homogeneous society to a society with a variety of ethnic and cultural groups. Therefore, Sweden began to carry out the policy of

multicultural to deal with problems caused by immigration in 1970s. In the meantime, it adopted measures to maintain traditional culture, social justic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o that to promote the harmonious of the society. To answer the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ethnic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conomic fluctuation, Sweden has been continuously adhering to and developing multicultural policy since 1980's.

124 Political Realism and Its Theoretical Revelation: From Raison-d'état to Realpolitik

LIU Feitao

It was not until the mid-20th century when "Political Realism" became a mature paradigm i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before that, "Political Realism" had gone through two developing stages, Raison-d'état and Realpolitik. By analyz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Raison-d'état to Realpolitik,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ainstream of this tradition and its specific meaning in concrete historical context. It also tries to find a historical angle to explore new ideas in theories of our own age, especially their theoretical concerns and meaning to present world.

142 A Review on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YANG Shaohua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is an interesting book that challenges fundamental aspects of current social science approaches based on simple, static or linear theories. By introducing concepts such as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y into the system framework, Robert Jervis provides a new system perspective and a new approach to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studies. It also reminds us of some subjects of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at are far from being settled, remain poorly understood and very much in ne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ACADEMIC ACTIVITIES

154 History of Asia-Europe Meeting: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DAI Yichen